

百年之后看“危言”

——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赵 诚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是中国从西方文明中的盗火者。郑观应和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

世界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由工业社会逐渐把世界纳入到一个以工业文明为背景的世界体系中来。中国自近代以来在工业文明的强大冲击下,亦被卷入到这个世界体系中。当时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对外界一无所知,以传统的概念来对付这个外来文明(当作蛮夷),但随着东西文明的撞击,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批要求向先进的工业文明学习、主张变

法改制的杰出思想家。在当时中国学界只知四书五经的封闭状态下,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头脑清楚、眼界开阔、思维活跃的一批人。在他们的代表作中,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可谓影响颇大者,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亦为广泛深远。无论是变法维新者,还是革命者,都受其熏染,就连毛泽东都受其影响。

郑观应在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一面在宝顺洋行打工,一面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所办英美书馆夜校部学习英语。1868年到上海和生茶栈当译员,不久承办这家茶栈,同时经营荣泰轮船公司。1873年受聘担任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总理,并在牛庄、上海等地开设商号、钱庄,成为买办商人。在此期间,他多次捐官,至候补道。因其交游广泛,资力雄厚,渐成上海滩名人。而与李鸿章的认识,是郑观应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事业的鼎盛期。从生于第

[作者简介] 赵 诚,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政治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学术随笔

一次鸦片战争，到逝于军阀混战的年代，他一生都在动荡和战乱中度过，一生也充满传奇和争议。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异国外埠，其间所历所闻，无一不在成就他一生的心血之作——《盛世危言》。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郑观应撰写《易言》，公开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张借民力巩固边防，建立“举国之民皆兵”的民团。中法战争之后，他在《易言》基础上完成五卷本《盛世危言》，于1894年出版。中日甲午战争与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又两次增改，最后形成八卷本三十多万字的《盛世危言》。在书中他提出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他首次提出“兵战”不如“商战”的思想。

《盛世危言》刊出后，朝野为之震动，人们竞相传阅，以至重印二十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部书。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即命印刷两千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枢金匱”，对后来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回忆起他的青少年时代时说：“《盛世危言》在我脑子里鼓舞起恢复我的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我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

父亲反对我这件事。关于这件事我常常口角，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美国著名学者R.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也说：“一本倡导改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国必须借鉴西方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他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别有意味的是，郑观应的儿子郑景康，后来成为职业摄影师，他于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了第一张标准像，1964年为毛泽东拍摄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标准像）

《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

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郑观应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制度，矛头直指数千年来高度专制的封建皇权，他在《盛世危言》中说：“窃谓中国之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有议院落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甚至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荇，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

所以针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他提出建立君主立宪的代议制民主政体。郑氏指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金国：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郑观应不但主张官员应像西方国家一样知识化和专业化，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而且对于中国数千年自上而下、以当权者好恶为标准的任用官吏的方法提

出了根本上的改革，这就是民主选举议员。他说：“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针对当时一些守旧人士以国情不同为借口不能建立代议制政体时，他都以坚定的态度进行了反驳。他说：“或谓：‘设议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针对一些人以国民教育程度低，不宜立即建立代议制政体的说法，他指出在国家急需政治改革的时候，社会不能等待办好学校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后，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应该政治体制改革和大办教育同时并举。他说：“尝闻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议广开学校，十余年有人材，而后立议院者，谓之经，即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并开学校，庶官绅知议绅（代议士）之贵，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者，谓之权，即兵出于奇。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

郑观应不但批判了专制政体，还批判了专制者的愚民政策，他非常重视新闻自由，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表达意见的最重要的场所，同时也是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地方，认为不让人民办报议政，国

学术随笔

家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弊即除,在《盛世危言》中他说:“古之时,谤有木(谤木就是相传古代时立在宫殿前或交叉路口上的木牌,人民对朝政有何批评书之于上,后来演变成宫殿门外的华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灼,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之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对于今天以“科教兴国”为口号的中国来说,郑观应对教育地位的认识,也仍不过时。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义务教育制,指出西方各国教育体制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他提出“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针对西方先进国家义务教育制,提出了县县办小学办中学,旨在国民中普及教育。主张妇女应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并反对妇女缠足。对当时中国教

育中重词章书法,提出了重格物致知、穷究天下物理的重自然科学的思想。同时,在基础教育中提出了职业技能的培训。不但使一般国民要粗通文墨计算,而且应培训一定的社会需要的生产技能。郑观应还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思想,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报纸让国民了解天下事,就各种问题在报纸公开讨论,也是对国民的教育。他特别欣赏西方国家鼓励国民游历探险,去探究未知世界的精神。

郑观应对社会犯罪和中国的司法制度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指出:“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哀世,犹有哀矜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武健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①他认为很多社会犯罪是因为这些犯罪者没有受到教育,他认为这些犯罪者“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②。对于社会犯罪,郑观应不像迷信暴力的封建统治者一味只知严刑峻法,而一本中国古代先哲的仁爱之心,一方面探究其社会原因,一方面充满了人道关怀谴责了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在《盛世危言》“狱囚篇”中他说:“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务喜。’哀痛恻怛,诚仁人之用心也。盖人生

不幸，父母失教，既无恒产以资历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饷。贫困无聊，流于匪类；致罹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毒若虎狼，秽气积成疠疫。自斩、绞以下诸罪人本无法，而久系痍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⑬他还特别谴责了中国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他说：“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鞠而酷打成招，独见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中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⑭

正像康有为托古改制，在整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只认同传统的价值体系时，当时的维新人士也都是从传统经典中寻找变革的理论依据。在提出变革主张时，郑观应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不变之法……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⑮在提到建立民选的代议制政体，设议院时，则引用《书经》说：“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相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⑯从郑观应引用的变法理论依据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只有墨守成规的信条，而且也真有适应不断变化的开放社会的一面。

从郑观应1873年出版《数时揭要》以

一布衣倡言救国，到1880年出版《易言》呼吁学习西方，到呼吁变法的三个版本《盛时危言》的问世，郑观应一方面参加中外的近代的工商业活动，一方面不停的思考关心着中国的命运。其对中国社会的关怀和积极参与的精神令人敬重。

在极端意识形态统治时期，买办与卖国几近同义，郑观应这些曾以买办身份与西方文明接触的这些最早的中国人，几乎都有“卖国”之嫌，在“改革的不如革命的好”的观念指导下，类似郑观应、冯桂芬等这些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评价不高，所以在过去的教科书中介绍他们时只一笔带过。今日中国的学术界，应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人物和问题，站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认真对待真厘清。像郑观应这些思想家们，是第一批从树上下到地面站起来走路的猴子，他们从传统思维模式中冲出来的弥天勇气，可歌可叹！今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在中国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时，对他和他的著作回顾也算是对中国近来以来改革的先辈们的缅怀。[■]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 郑观应集》第 499、322、311、313、316、324、345、265、265-266、267、499、265、505、500、301、3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